

事日本”之事上,对“倭寇”选择了集体性失忆。陈文源、李宁艳《莫登庸事件与明代中越关系的新模式》(《暨南学报》第1期)指出嘉靖六年,明朝迫使莫登庸前来归顺,并授予莫登庸“都统使”官衔,使安南在理论上成为明朝辖理的特区。李华川《“西人掠食小儿”传说在中国的起源及流播》(《历史研究》第3期)指出传说最早由16世纪初葡萄牙人在华贩卖儿童的行为所引发,明中后期及清前期已在民间具有广泛影响。该传说还与国人传统的华夷观念及修炼方术有关。董少新《明末奉教太监庞天寿考》(《复旦学报》第1期)考察了明末奉教太监庞天寿募葡兵抗清及请永历入教之事。夏伯嘉《明末至清中叶天主教西文文献中的中国:文献分布与应用讨论》(《复旦学报》第5期)论述了耶稣会文献的种类、特征与现有的分布情况。孙景尧、龙超云《天主教与南明永历王朝关系蠡测——以安龙碑为中心》(《学术月刊》第9期)指出安龙拉丁文碑记具有将中国变成“皈依天主的东方罗马帝国”之意图。

唐代屯田研究综述

李文益 李少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

《天圣令》的发现及研究的深入,极大地推进了唐宋法制史及经济、政治制度的研究,获得了可喜的成果。在历史所举办的《天圣令》研读班中,通过逐条逐句对令条的释读,发现了许多以往未及展开讨论或讨论有待深入的论题。继续这些研究,需要将以往相关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更为细致的梳理。本文是研读班的系列成果之一,以后随着各卷的陆续展开,将继续进行相关问题的学术史回顾。

研究唐代经济、土地制度、边政等诸多领域,屯田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研究内容,相关研究在1949年以前就已开始。1939年张君约《历代屯田考》(商务印书馆)、1944年唐启宇《历代屯垦研究》(正中书局)两部著作开启了系统研究古代屯田的先河,其中包含了唐代屯田的相关内容。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外学者对屯田的研究兴趣不减,日本学者青山定雄《唐代的屯田与营田》(《史学杂志》63-1,1954年)研究了屯田经营方式的变迁,稍后英国汉学家崔瑞德《唐代的官田》(《东方经济社会史杂志》2-2,1959年)、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租粟与军粮》(《东洋史学》5,1962年)都对屯田和营田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赵吕甫《唐代初期的屯防军制》(《文史哲》1957年第4期)从军事屯田的角度对唐代屯田进行了探讨,从而揭开了建国后中国学者研究唐代屯田的序幕。之后围绕着史书对屯田的零星记载,以及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丰富的屯田史料,众多学者对屯田展开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史料的缺乏,学界对屯田、营田的关系,屯田的管理体系等问题,仍众说纷纭,迄无定论。近年来,

天一阁所藏《天圣令》的发现,为深入进行屯田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新史料。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举办的《天圣令》读书班中,老师和同学们发现,对于唐代屯田问题的研究成果有必要进行梳理,以便于今后学界使用《天圣令》的新史料作进一步研究。

一、唐代屯田的分布

首先,边境屯田。吴章铤《唐代农民问题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61年)指出,屯田在玄宗以前设置的并不是很广泛,但在玄宗以后,开边渐盛,屯田方大量设置。郑学檬《试论隋唐的屯田和营田》(《厦门大学学报》1962年第3期)开启了建国后大陆学者系统研究唐代屯田和营田的先河。他认为军事性屯田的分布区域,大致分布在以下几个地区:以太原为中心的朔州、代州、并州;西北边州屯田,包括关内道、陇右道,有灵盐、泾原、邠宁、河源、凉州、肃州、甘州、轮台、伊吾等地;北边州镇屯田,中、西受降城和丰州一带;辽西和高丽屯田;西南地区的松州屯田。乌廷玉《关于唐代屯田营田的几个问题——和郑学檬同志商榷》(《文史哲》1964年第2期)认为,唐代屯田的规模很大,而郑氏所述仅仅提到了其中的一部分。他根据玉井是博《南宋本大唐六典校勘记》,把中华书局本《唐六典》所脱落的屯田注文全部提出来,结果发现在开元二十五年(737)以前,全国军屯总数是1140屯,其中80%以上分布在边疆地区。黄正建先后发表了《唐代前期的屯田》(《人文杂志》1985年第3期)和《唐代后期的屯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认为唐代前期屯田的分布情况和规模大小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唐开国至高宗仪凤二年(618—677),此阶段屯田主要设置在北方;仪凤二年至开元二十五年(677—737),屯田规模扩大,主要设置在西北和北方;开元二十五年至安史之乱(737—755),因广泛实行和籴而使屯田减少。对于唐代后期的屯田,认为从安史之乱至穆宗时期,边疆屯田较少,主要分布在西北边的甘、肃、瓜、泾、灵等州以及丰州、振武一带;南边的客州、韶州、嵩州地区。穆宗以后,边地屯田设置较为普遍。赵吕甫《关于唐代前期军屯田经营的几个问题》(《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指出,唐代前期由于均田制的推行,军镇屯田数量迅速超越了内地。于德源《唐代幽、妫、檀州农田与作物分布蠡测》(《中国农史》1992年第2期)根据《太平寰宇记》所载唐末幽、檀、妫三州乡数推算,其军屯数明显高于民田数。王义康《唐后期河北道北部地区的屯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辑)则基于于氏的论断,认为蓟、平、营三州屯田亦高于民田水平。李宝通的专著《唐代屯田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对唐代的屯田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同意吴章铤的看法,认为在唐初边境地区的屯田规模不算很大,到开元、天宝年间,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及募兵制的兴起,边地屯田的规模在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到天宝年间,边境的屯田已很繁荣。

其次,内地屯田。郑学檬在前述文中除详细考证了边州军事性屯田外,还着重介绍了非军事性屯田的分布,这类屯田包括京城附近的屯田;淮南、浙西屯田;北方和东北边境屯田。除此之外,在内地其他地区尚有零星的非军事性屯田。黄正建认为在唐前期内地屯田很少,主要有两京宫苑的屯田、东都屯田、京兆屯田和长春宫屯田等。他还引《唐律疏议》卷28《捕亡》“邻里被强盗”条《疏议》中的“村、坊、屯、驿”,卷26《杂律》“不应入驿而入”条《疏议》中的“边远及无村店之处,……遇屯、驿止宿”,并认为这里的“屯”是内地自成系统的屯田区。对于唐代

后期的屯田,他认为从安史之乱至穆宗时期,屯田的设置多在内地,主要在集中在河南、京畿、襄邓地区和江淮一带(见该氏前引文)。翟麦玲、谢丽在《辨析唐代的屯田与营田》(《中国农史》2008年第1期)中认为在内地空闲之处只有小规模屯田的设置。

二、屯田的生产者

关于生产者与所有制关系,郑学檬通过对土地制度及耕牛、农具和种子的相关规定中,得出唐代的屯田有着很高的剥削率。“屯兵、屯民都是国家的农奴”,“屯垦土地的所有权归封建政府掌握,劳动者只有使用权或者暂时的占有权”。但到唐后期在一些地区以招募民户为劳动者的屯(营)田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发生了变化(见该作者前引文)。王义康《唐后期河北道北部地区的屯田》对郑氏观点予以肯定,认为唐后期河北道北部部分边防军镇屯田的所有制关系已开始发生了变化。杨际平《唐五代“屯田”与“营田”的关系辨析》(《汕头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也认为“屯田的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屯田兵民充其量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关于生产者的具体来源,黄正建在《唐代前期的屯田》中认为民屯的耕作者主要是征发的丁夫,即均田后占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并且认为政府应有统一的计功标准和配丁名额,征发丁夫耕屯田可以看作是均田农民的一种徭役。他又在《唐代后期的屯田》中,进一步认为屯田的劳动者前后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在军屯中,唐前期士卒都有番期,且不带家口,唐后期出现了招募士卒屯田的现象,允许携带家属。其次,唐后期出现了专门从事屯田的军队,并有役使百姓耕种的现象。此外,在非军屯中劳动者的成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普遍招募贫民耕种、出现了雇佣劳动者。杨际平在《上海藏本敦煌所出河西支度营田使文书研究——兼论唐代屯营田的几种经营方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和《唐五代“屯田”与“营田”的关系辨析》两篇文章中同意黄氏关于唐前后期屯田劳动者的成分发生了变化的论断,他认为“田军”、“田卒”、“营田官健”就是专门从事屯田或以屯田为主的士卒。王义康在前述文中也认同这一观点。赵吕甫《关于唐代前期军屯田经营管理的几个问题》认为军屯的直接生产者屯丁,屯丁是从屯防士卒中挑选出来的,唐前期防丁除了府兵外,尚有兵募、义征兵、谪戍兵、蕃兵以及奴兵,至于屯兵究竟属于哪种,还不能明晰。马国荣在《唐代西域的军屯》(《新疆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认为西域军屯中劳动者的来源主要是正规部队,其次还包括内地流配来的犯人、当地各族人民、健儿及随军家属。李宝通同意马氏的看法,并进一步指出初唐屯田的生产者主要是从均田户中征发的府兵,认为这是兵役的一部分。此外,他认为“唐代前期还有相当规模的罪、谪、徙类屯田生产者”。到武则天时期,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必然导致土地兼并的激烈,而土地兼并的激烈又使失地农户纷纷逃亡”,这样大量逃户的存在就为设置屯田提供了潜在的劳动人手(见该作者前引文)。翟麦玲、谢丽《辨析唐代的屯田与营田》也指出,在唐代,屯田的经营者多为军士,但也有百姓屯田的现象。关于屯田兵民的组织形式,杨际平《唐五代“屯田”与“营田”的关系辨析》认为“一般采取军事编制或准军事编制,不同于一般的编户齐民”。

三、屯田与营田的关系

关于两者的关系,郑学檬曾较早的进行了辨析,他指出,屯田与营田是不同的土地制度,但一般史籍中往往将两者混淆,这是由于“营田本来就是屯田的另一名称,只是后来营田性质变了,而习惯叫法未变”,另外,即使后来两者不同,也不是决然分开的,两者仍有共同点,故而造成了屯田与营田不分的情况。关于两者的共同点,首先,一般营田都是军事性的,其目的也在解决军队的粮饷问题。其次,许多营田是出于安置流民,发展生产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这和非军事性屯田性质上是一致的。两者的不同点,主要包括第一,管理制度不同,营田的管理不是由中央设置专门机构管理,而是由节度使兼领的。第二,经营方式不同,营田越来越采用一般地主的经营方式。第三,直接生产者不同。屯田由士兵、罪人、流人来生产,都是国家的农奴;而营田的直接生产者中有不少营田户得到了土地所有权而成为了自耕农。总之,由于营田与屯田有着明显的共同点,所以“一般所说的营田可以认为就是屯田”。他还认为营田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已慢慢失去了其国有性质了,屯田向营田转化,是封建土地国有制向私有制转化的一种途径。翟麦玲、谢丽继承郑氏观点,她们在《辨析唐代的屯田与营田》中也指出,唐代的屯田与营田是两种不同的土地经营制度,二者既相联系,又有区别。二者的相似之处包括经营人员、设置地点、经营方式、都有转化为民田的情况。相异之处主要是在中央的直属机构不同、地方级管理机构不同、基层管理组织不同、督察巡视的职官不同。文中同样分析了屯田与营田极易为人所混淆的原因,认为除两者有诸多相似之处外,还包括文献记载用语比较模糊、营田使职责的双面性以及宋以后对屯田与营田已不甚区分等。乌廷玉《关于唐代屯田营田的几个问题——和郑学檬同志商榷》认为唐高宗以后,陇右道扩充了屯田区,设置营田使,从此唐代的屯田也称营田。到安史之乱后,营田在经营管理和劳动力方面都与普通屯田有所不同,这时的营田名称已逐渐固定化了;到唐代末期,营田已不再是普通屯田了。对于郑氏关于营田区“主要在西北和北方各州镇”的说法,他认为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通过其所列的《唐朝后期全国营田分布表》可以看到,到唐代后期全国三分之二的营田区在内地。乌廷玉不同意郑氏所述由节度使兼领营田事务的观点,他认为在元和十四年(819)以后,除了河朔三镇以外,全国各道的营田都是由中央政府管理的。黄正建则认为屯田与营田在唐代前期指的是同一件事,营田即屯田。闰土《屯田:两千年农地规模开发(上)》(《中国土地》1996年第6期)同意黄氏意见,认为在唐代前期营田就是屯田。殷崇浩在《浅叙唐代营田户》(《江汉论坛》1986年第3期)中认为终唐一代,营田都是与屯田基本相同的公田经营法。针对黄、殷二人的观点,李宝通《联系语言词汇的发展规律试析屯田营田的分合异同》(《西北师大学报》1988年第4期)认为,“营田”可理解为“营种屯田”,唐高宗时期,是“屯田”与“营田”同义互代的较为明确的开端。到开元十二年(724)由宇文融建议实行的营田,是“屯田”与“营田”词义分离的最早事例。杨际平在《上海藏本敦煌所出河西支度营田使文书研究——兼论唐代屯营田的几种经营方式》中认为营田的含义很广泛,它既可以包含较大规模的屯田,也可以指小规模的经营田土。他又在《唐五代“屯田”与“营田”的关系辨析》中对此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辨析,认为在唐宋以前及唐宋时期“营田”一词适用的范围很广,其本意即为经营田地、耕垦田土。仅就营官田而

言,“营田”的含义比“屯田”广泛。“营田”包括“屯田”,且以“屯田”为主,但“营田”却并不都是屯田。“就屯田而言,言其为屯田,与言之为营田,都是一回事。”他同时认为,“营田”一词还可以涵盖诸镇戍烽铺兵营种的田土以及由各地官府统一经营的公廩田、职分田。而到唐后期,“营田”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同于唐前期;狭义则专指户部营田务的营田。杨氏不同意郑学檬提出的屯田向营田转化的观点,他认为唐后期屯田继续存在,并未转化为营田。但杨氏关于“营田务”的理解,卢向前、李宝通、刘进宝等人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卢向前在《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中认为“营”在当时含有经营之意,并非为“营田”所专用。李宝通在其专著《唐代屯田研究》中亦认为,“营田”之“营”,本为经营之义。因此,“营田”与“力田”、“耕田”、“垦田”、“种田”等词相比,“似倾向于有组织有计划或有一定规模的耕垦农田”。“营田”一词由早期私人营田,至唐初而更多地带上了政府倡导的色彩。这两种因素加在一起,便促成了中唐内地以民为之的屯田称作“营田”的一种动因。此后,刘进宝在《归义军时期敦煌的营田及其管理系统》(《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2期)中也认为“营田”之“营”并非一定是“营田务”经营的土地,也并非一定是“屯田”之土地,有时也指“经营”、“耕种”田地,例如归义军时期的“营田”就属这种情况。

四、屯田的管理

第一,屯田的组织与管理。郑学檬指出,屯田不管是军事性或非军事性皆由尚书省工部尚书总领,屯田具体事务分由工部屯田郎中、司农寺和各州镇军管理。黄正建在《唐代前期的屯田》中认为在中央由尚书省工部屯田司和兵部管理。尚书省以下,屯田的实际管理分属两个系统,即司农寺系统的屯田和州镇诸军系统的屯田。关于基层管理者,他认为司农寺系统的屯田,屯监设监丞各一人,下属诸屯每屯又有屯主、屯副各一人;由州管理的屯田,其下层直接负责机构,主要是田曹,兵曹也协助管理。诸军营田使管理的屯田,在营田使下设有营田副使、营田判官和营田巡官等官员。州诸曹和军镇判官巡官以下管理屯田的官员也是屯主、屯副。李宝通《唐代屯田研究》认为“唐代屯田既未隶司农,亦非由工部负主要责任,它是由中央政府统筹协调、分工配合加以严密管理的”。赵吕甫在《关于唐代前期军屯田经营管理的几个问题》中指出,镇领屯田及戍管屯田在交割粮食时,应由镇将、副将、仓督等会同屯田监仓官进行验收。吴大旬《从出土文书看唐代西州的屯田》(《新疆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认为唐西州屯田非常重视不误农时,违者要受到处置。唐西州军州屯田在严格的定等制度下,对收获限制极严,若有欠纳,则要追征;西州兵粮入仓的检验制度非常严格,缴纳粮食时,一般须经屯官、监纳官、监仓官及仓督共同检验后方可入仓。其后,他又在《从出土文书看唐代伊州的屯田管理》(《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中指出“唐政府向来一直坚持对屯垦上报情况进行检勘”,“其目的在于防范弄虚作假的行为”。翟麦玲、谢丽在前引文中指出,每屯都设有屯官,屯主、屯副、屯监、屯丞即为屯田最基层的管理官。这些屯官多由品官担任,一般“取勳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资边州县府镇戍八品以上文武官内简堪者充”。李锦绣《唐代庭州地区的人口和营田》(《文史知识》2010年第2期)考察了庭州屯田的情况,她认为对屯官考核要以屯田的收获量为依据,高者奖赏,低者受罚。

第二,营田使。围绕吐鲁番文书《唐河西支度营田使户口给粮计簿》,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韩国磐、池田温、姜伯勤、王永兴等人都对营田使进行过研究,为便于更好地利用此文书,唐耕耦在《敦煌所出唐河西支度营田使户口给粮计簿残卷》(《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7年总第10期)中对该残卷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录文和推断,为后来者进行研究提供了方便。关于营田使设置的时间,黄正建《唐代前期的屯田》提出延载元年(694),娄师德任河源等军营田大使,这是唐代“营田使”职称的正式出现。与“营田使”同时并用的还有“知营田使”、“检校营田事”、“营田游击将军”等职称,直到玄宗即位后这一类官号才统一为“营田使”。他还指出当时任营田使者不一定是道镇长官,到了开元九年(721)前后,节度使才全部兼营田使。何汝泉《唐代使职的产生》(《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也指出营田使始置的时间是在延载元年(694)。但宁志新在《唐朝营田使初探》(《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中认为营田使之名最早出现于王世充开明二年(620)。至于唐朝营田使的始置时间,则最迟不会晚于武则天如意元年(692)。此外,他还认为唐朝的营田使分为州(军)、道、诸道三级,营田使的设置是沿着由外向内、由边疆向中原的方向逐步展开的。营田使从设置之始,就具有常设固定的性质。大量设置营田使,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唐朝原设的管理屯田事务的机构已不能适应屯田、营田生产逐渐扩大的需要”。冯培红《唐五代敦煌的营田与营田使考》(《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宁氏关于营田使设立的时间也不准确,营田至迟在北魏时已经出现了,并设置了专门掌管营田事务的营田大使一职。他还对武则天时期、开元时期、吐蕃占领时期和归义军时期敦煌营田使及其官职体系进行了考证。关于营田使的执掌,陈仲安、王素在《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中认为营田使主掌边境屯田。而刘进宝在《归义军时期敦煌的营田及其管理系统》中具体考察了敦煌的营田使,他认为敦煌营田使所主掌的并非边境屯田,而主要是境内的土地分配、授予、请射、对换等。除节度使兼领的支度营田使以外,其下还有各州具体管理营田的官员“都营田”或“营田使”,负责管理土地的调查、登记与分配工作。吴大旬《从出土文书看唐代西州的屯田》认为西州都督府具牒向伊西(北庭)支度营田使呈报,表明支度营田使对镇戍营田不仅统一部署,而且管理严格。翟麦玲、谢丽认为唐代营田使职名前常冠以支度或度支之名,表明支度营田使即支度使与营田使合一,亦说明这一时期营田使归户部管理。

五、屯田的分类

郑学檬指出,屯田根据性质可分为军事性屯田和非军事性屯田,大部分是军事性屯田,非军事性屯田只是军事性屯田的变通而已,并总结了两者的四点不同。关于是否存在烽铺屯田,程喜霖在《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唐代烽堠制度之三》(《武汉大学学报》1985年第6期)中结合吐鲁番文书认为唐代存在烽铺屯田,并认为唐代的烽铺屯田继承汉制发展而来,开始于高宗时期,发展于玄宗时期,到开元时已普遍推行并制度化了。这种屯田面积较小,其生产的粮食主要是就地贮存,以补充烽帅、烽子、铺人的粮食和蔬菜需要。而杨际平《唐五代“屯田”与“营田”的关系辨析》认为“屯”的本意为“聚”,所以“屯田”必须“聚人而作,聚田而耕”,这就决定了屯田必须是“大面积的大体成片官田”,零星分散的土地则无法置屯。基于此,他认为

镇戍烽铺的营田因其田土都很零碎分散,不成规模,故只能称为“营田”,不能称为屯田。同样,他认为属于军事系统的其他各种官田,也都只能称为“营田”,而不能称为屯田,并认为这是唐代各节镇主管屯田等事务的使职不称为屯田使、支度屯田使,而称为营田使、支度营田使的原因。吴大澂在《从出土文书看唐代西州的屯田》中利用诸多吐鲁番出土文书对唐代西州的屯田进行了细致的考证,他认为从出土资料看,唐代西州的屯田确有烽铺屯田,并根据文书在程喜霖的基础上对西州烽铺屯田的劳动力、收贮、管理及其作用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此外,他还认为屯田还有军州屯田、镇戍屯田。对于日本龙谷大学所藏第3786号吐鲁番文书所载“柳中屯田三十顷”,李锦绣在《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二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中认为这不属于屯田,而是另一种性质的斫田。而吴大澂则认为应属于军州屯田,因为唐在西州设有柳中仓,这反映了柳中屯田有较大的规模,理应以军州士卒屯田为主。黄正建认为按照经营方式的不同,屯田可分为军屯和非军屯两类,军屯在唐前期屯田中占多数。杨际平在《上海藏本敦煌所出河西支度营田使文书研究——兼论唐代屯营田的几种经营方式》中则根据屯田劳动者的身分的不同,将屯田分为“军士屯田”与“非军士屯田”两类。闰土在《屯田:两千年农地规模开发(上)》中将屯田分为军屯、民屯和商屯三类。王义康《唐后期河北道北部地区的屯田》则将其概括为“军镇屯田”和“非军镇屯田”两类,与黄氏所分大同小异。并认为檀州有营麦将、营田将之称,乃是非军镇屯田的管理者。此后,姜密《唐宋时期国有土地经营方式的变化及其原因》(《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姜密、纪永起《唐宋国有土地政策的变化及其量化分析》(《河北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李并成《唐代前期河西走廊农田开垦面积估算》(《档案》1989年第6期)等人逐渐接受了“军屯”、“民屯”说。

六、屯田的收获

郑学檬认为司农寺下属的屯田,收入归封建政府所有;隶属于州镇诸军的屯田,则由节度使、刺史、领兵将领管理,其收入用于支付驻军粮饷及州镇本身费用。但黄正建通过对唐代前期屯田的考察,认为军屯田士卒的口粮由官方供给,收获物似全部上交。这一观点得到了陆离的认同,他在《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官田与营田》(《南京师大学报》2009年第3期)中认为唐前期军士屯田,产品一般都直接上缴。赵吕甫在《关于唐代前期军屯田经营管理的几个问题》中认为开元以前,军屯田生产的粮食始终执行着留军、留州定额管理的政令,而非由军镇全权支配。此外,他还考察了屯丁口粮的配给、对屯丁的资助等问题。针对龚荫在《古代边疆民族地区屯垦开发概说》(《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中所认为的“屯田收入便完全解决了边防军的粮食问题”,以及赵俪生《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所认为的“西北边地仍以屯田作为解决军粮的主要来源”这种观点,村渭在《隋唐青海屯田述论》(《青海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通过考察唐代青海的屯田,认为如按和平年份来说,则屯田的收获足够支持驻军需要,但若遭遇战争,屯田产量降低,则军粮的很大一部分需要和余解决。柳敏在《试析唐朝前期安西四镇的屯田及其效果》(《唐都学刊》2004年第6期)中通过对安西四镇屯田收获的分析,认为其产量仅占驻军所需粮食的44%,其余粮食需要靠和余解决。而李锦绣对营州和庭州的考证,则印证了龚荫和赵俪生的观点,李锦绣《唐代庭州地区的人口和

营田》也认为北庭的屯田营田不仅保证了北庭军队兵马浩大的食粮支出,而且还能向其他地区输送粮食。

七、屯田其他方面的研究

除集中于上述问题的讨论外,还有很多学者涉及了屯田其他方面的研究。例如饶瑞符在《米兰汉唐屯田水利工程查勘——从伊循的灌溉系统遗址看汉唐时代的屯田建设》(新疆巴州农垦勘测设计队,1977年)中,结合米兰地区汉唐屯田水利工程的考古发现,对当地汉唐时期的屯田概况进行了阐述。关于屯田与地子的研究,姜伯勤《关于〈牛定相辞〉》(《考古》1978年第3期)认为“地子”包括政府抑配予民佃种的屯田、职田、公廨田等土地上的地租。鲍晓娜《唐代“地子”考释》(《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4期)认为唐代屯田确有“配地出子”的情况,并且在出土文书中还载有“废屯”征纳地子的材料。关于“部田”与“屯田”关系研究,杨际平《试考唐代吐鲁番地区“部田”的历史渊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期)认为部田或许与屯田有关。而赵吕甫《唐代吐鲁番文书“部田”“常田”名义释疑》(《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反驳了杨际平的观点,他认为常田、部田不是民田和屯田。之后杨际平《也谈唐代西州的土地管理方式——再论唐代西州的两种授田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再次强调部田源于屯田部的观点。关于屯田土地来源的研究,赵吕甫在《关于唐代前期军屯田经营管理的几个问题》中认为军屯土地的来源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前朝遗留下来的废屯重新加以垦用;一类是利用均田土地以外的闲荒土地设屯;一类是军屯土地不足时,请求调拨邻州屯田支援。杨际平《唐五代“屯田”与“营田”的关系辨析》认为在唐后期军事系统屯田有时也有侵占民田的现象。李并成在《唐代前期河西走廊农田开垦面积估算》对河西屯田面积进行了考察。马国荣《唐代西域的军屯》对西域屯田粮食的种类、生产工具以及粮食的储藏进行了考证。李宝通在《唐代屯田研究》中对唐代统治集团对屯田管理与干预的轻重缓急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他还在《唐代屯田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1期)中从五个方面对唐代的屯田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总结。冯金忠《试论唐代河北屯田》(《中国农史》2001年第2期)以安史之乱为界,对唐代前后期河北屯田的分布、管理进行了研究。孙彩虹《唐代屯田、营田费用与效益的量化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对屯田营田的财政、经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姜密、纪永起《唐宋国有土地政策的变化及其量化分析》同样对屯田进行了量化分析,认为在唐代前期,国家实行直接经营制,导致了屯田入不敷出的局面;到唐朝中后期,国家对屯营田实行了租佃经营,则使收入有了很大改观,扭转了入不敷出的局面。此外,汉唐进行比较研究一直是学界的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对屯田的研究也有部分学者作了比较。王晓晖《汉唐时期吐鲁番地区的农业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就屯田对水利开发及生态环境的影响作了研究。买买提祖农·阿布都克力木《汉唐时期西域屯垦及其作用》(《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对汉唐的屯田思想和屯田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

八、《天圣令》的整理与复原及其对屯田研究的意义

自从1999年戴建国先生发现《天圣令》的部分内容以来,便引起了中日学界的高度重视,200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课题组整理复原的《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校证》由中华书局出版,为唐宋研究提供了便利。《天圣令》所附唐令及复原的唐令中包含了大量直接关于屯田的史料,例如《田令》46—60条,《赋役令》26条、47条,《仓库令》19条,《厩牧令》19条。其中《田令》52—60条9条令文是前所未见的新史料。此外,其他令文也间接包含了关于屯田的设置、管理、储藏等方面的规定。

近年来,已有学者根据上述史料开始了对屯田的研究,并初步体现了《天圣令》中关于屯田令文的价值,例如日本学者大津透在《北宋天圣令的公布出版及其意义——日唐律令比较研究的新阶段》(《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9期)中比较了中日令文对于屯田的不同规定,从而阐述了两国关于制度方面的差异。早年王永兴先生在《唐田令研究——从田令和敦煌文书看唐代土地制度中几个问题》(《纪念陈垣诞辰一百周年史学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中认为《唐六典》卷七屯田郎中员外郎条所载三段涉及屯田的文字是《田令》的一部分,但《天圣令》的发现证实其并非令文。戴建国《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认为此三条对屯田的叙述十分详尽周备,“似乎是屯田法的具体实施细则”,故而他认为应属《屯田式》的遗文,而非《田令》,并借此探讨了律令格式的关系。此外,他还逐条分析了令文,认为《田令》49条反映出“唐即使是屯田,亦皆有田簿登录,由屯田官负责绘制田亩图状。并有一套管理制度,作为分配耕牛和劳力的基本依据”。51条反映出“唐前期屯田所用劳动力,主要靠征发来的丁夫”。52—60条为新史料,从中可以看出:第一,屯田收获物的解纳,依地理远近分别纳于司农寺和就近州县。输纳者和受纳仓司须在规定的期限内各自申报有关部门。第二,诸屯田收获物输纳、贮藏所需劳力,从营田丁和饲牛丁中抽差。第三,在屯田收获季节,如遇警急情况,可酌情量差兵士保护助收。第四,屯田收获物损欠,由屯田官负责理赔。屯田官负有保管收获物的完全责任。第五,屯田处的百姓田亩,每年按其收成好坏,分三等上报,作为上级考校屯田官业绩的比照参考。第六,司农寺长官定期巡查所属屯田,各屯有严格的考校和审计制度。杨际平《〈唐令·田令〉的完整复原与今后均田制研究》(《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也围绕着《田令》关于屯田规定探讨了令与式的关系,认为式是对令所作的补充,而不是对令文的变通。另外,宋家钰在《明钞本天圣〈田令〉及后附开元〈田令〉的校录和复原》(《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中对《田令》的复原问题作了再探讨。

总之,学界对于屯田的认识还存在着诸多的争论,随着《天圣令》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屯田的认识有望更加清晰。